

爲了出版《遭難前後》的事，我與周海嬰通過幾次信，但從未見過面。因此，周海嬰忽然打電話給我，使我感到意外，也很高興。

「你在北京？」我問。

「在太古城。」周海嬰答。

「住在林家？」

「不錯，住在林家。……你不出街吧？」

「我來看你，好不好？」

「我來看你，」我說，「我趕着要到郵局去寄信，今天是星期六，太古城的郵局星期六下午不辦公。現在是十一點半，我必須在十二點之前將幾封掛號信寄出。郵局距離林家很近，還是我來看你。」

不等海嬰開口，就將電話掛斷，拿了剛寫好的幾封信、《香港文學》和照相機

● 劉以鬯

，匆匆趕往郵局，將信寄出，走去林家。林先生是海嬰的親戚，與我住在同一屋邨。五年前，爲「香港文學研究社」編《中國新文學叢書》時，我曾到林家去過兩次。

抵達林家，見到周海嬰夫婦，好像見到多年未見的老朋友似的，非常興奮。我說：

「見到你們真高興。」

周海嬰說：

「見到你，我也很高興。雖是初次會晤，却一見如故。」

平易近人的周海嬰，真誠篤厚，態度懇切，使我覺得介於彼此之間的陌生感很快就消失了，甚至可以說根本沒有陌生感。

「來了多少天？」我問。

「一個星期左右。」

「公幹？」

「到這裏來度春節。」

「文化界的朋友似乎都不知道你來香港？」

「知道的人不多。」

我將幾本《香港文學》送給海嬰夫婦，海嬰翻了翻，向我詢問雜誌的情況，我嘆口氣說：

「在香港辦文學雜誌非常困難。」

海嬰點點頭，表示這種情形是可以理解的。然後，他向我道謝，因爲我將《遭難前後》編入《中國新文學叢書》。《遭難前後》是由柯靈推介的，柯靈是海嬰的朋友，也是我的朋友。提到柯靈，我說：「這幾年，柯老曾兩次來港，第一次，參加中文大學於一九七九年舉辦的『中國現

代文學研討會』；第二次，參加中國電影學會於一九八三年舉辦的『探索的年代——早期中國電影研究』研討會。」

接着，我拿出照相機，爲海嬰伉儷拍了幾張照；海嬰也拿出他自己的照相機，請他的小姨林太太爲我們拍照。

拍過照，我問海嬰：

「下星期一晚上有空嗎？」

「星期一晚上已有約會。」

「星期二晚上？」

「沒有事。」

「星期二晚上到『麗斯』去吃自助餐。『麗斯』就在『太古城中心』。我們都住在太古城，在『中心』吃東西比較方便。」

「吃自助餐要花不少錢。」海嬰說。

「不成問題，」我說。「現在，我要走了。星期二晚上六點半來接你們。」

二月四日晚上六點半，發完稿子從報館出來，偕同妻子走去林家接周海嬰伉儷。朝「太古城中心」走去時，我問海嬰：

「第一次來香港？」

「第三次，」海嬰答。

「第三次？」我感到意外。

「小時候來過兩次。我曾在培僑小學念過一年書。」

「既然這樣，對香港總還有些印象。」

「今天的香港與以前的香港大不相同。從林家到『太古城中心』，只有幾分

談閑嬰海周與

鐘的步程。我們搭乘電梯上四樓，進入「麗斯餐廳」。這天晚上，因為不是假日，食客不多，相當清靜。侍者引領我們朝靠窗的位子走去，我聽到海嬰用粵語與侍者交談。

坐定，我問海嬰：

「你會講廣東話？」

「多年不講了，有些已記不得。」

「你的廣東話比我好得多。我在香港住了三十多年，依舊只會講些唔鹹唔淡的廣東話。」

「成年人學第二種語言總不及小孩子那麼容易。你來香港時已三十左右，我却是在這裏讀小學的。此外，我能講廣東話，還有兩個理由：一，母親是在廣東番禺出世的，曾在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教過書；二，父親死後，蕭軍蕭紅介紹我們搬去霞飛路霞飛坊居住。那時候，我們的女傭是廣東人；房客也是廣東人，我有許多機會講廣東話。不過，結了婚之後，爲了避免引起妻子的誤會，很少與母親用粵語交談。」

「蕭軍蕭紅爲什麼介紹你們搬去霞飛坊居住？」

「那時，他倆住在霞飛坊，向別人租一個房間。」

「這些年，與蕭軍有聯繫嗎？」

「有的。內山完造誕辰一百周年時，我與蕭軍一同應邀赴日。」

提到蕭軍，難免聯想到胡風。胡風與蕭軍一樣，也受過魯迅的教誨，對魯迅有很深的理解。

「胡風呢？」我問。

「胡風離開人世前，精神已恢復正常

。他還有許多寫作計劃……」海嬰的語氣好像在嘆息。

關於胡風，我有一些問題要向海嬰請教。但在這種場合，只能隨便聊聊，對這一類的事情不便透過表面作深入的討論。再說，這是應該到餐枱邊去選取食物的時候了。

我們站起，一同走去選取食物。選好食物，回座，邊吃邊談，想到什麼就談什麼，話題雖廣泛，總是點到即止。談了十幾分鐘，我忽然想起《時代文學》創刊號刊出的那封信。從那封信中，我知道海嬰小時候喜歡集郵。因此，我說：

「一九四一年六月出版的《時代文學》創刊號刊出景宋先生的手蹟，裏邊提到你小時候集郵的情況，說你喜歡收集蓋郵戳的郵票，而且希望郵戳蓋在郵票的右上角。」

「不錯，我小時候喜歡集郵。」

「現在呢？」

「不集了。」

「郵集還保存嗎？」

「送給孩子了。」

「我也從小就喜歡集郵，不過，興趣到現在還沒有消失。」

「蒐集哪一類郵票？」

「區票。」

「日本郵學家水原明窗收藏的區票十分豐富。」

「你已不再集郵，怎會知道水原明窗？」

「從郵票雜誌上看到的。」

「水原明窗可以說是區票專家。我曾經與他通過幾封信。」

「你怎會跟他通信的？」

「一九七九年，本港舉行『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展覽』，《明報月刊》知道我喜歡集郵，要我寫一篇文章談談是次郵展的展出品。文章發展後，水原明窗從日本寄信來要我回答幾個有關區票的問題。我郵識膚淺，答不出，只好坦白告訴他。他寄了兩厚冊藏品影印本給我。」

談到這裏，海嬰發覺我菜盤中還有不少菜，就說了這麼幾句：

「我們邊談邊吃，你不要只談不吃。你看，我的一盤已吃完，談話並不影響吃東西。」

從言談中透露的率真，使我發覺了海嬰的坦誠與善良的品質。我當即低頭進食。海嬰吃完一盤後，再一次走去餐枱邊選取食物。我問周太太：

「海嬰有興趣寫作嗎？」

也許我說出這句話時的聲調較低，周太太顯然沒聽清楚我的問題。她答非所問地說了這麼幾句：

「海嬰小時候患哮喘病；後來，胃部還開過刀，反應不好。不過，五十歲之後，健康情形很好，沒有什麼病痛。」

「健康是最重要的，」我說。

海嬰端着一盤西餅回座，盤子裏有芝士餅。

「我喜歡吃生蠔與芝士，」他說。

「芝士的營養價值很高，」我說。

海嬰不但自己愛吃芝士，還慫恿他的妻子去拿。當周太太走去拿芝士餅時，我仍想知道海嬰是否對寫作有興趣。我問：

「使你最感興趣的，是什麼？」

「社會科學與無線電。」

「無線電？」

「我是讀物理的，對無線電特別感到興趣。我少年時曾與好幾位無線電愛好者通訊。此次來港，還與一位小時候的無線電通訊朋友見過面。」

「玩無線電，與蒐集郵票一樣，也是業餘癖好。」

「除了集郵外，你還有其他的業餘癖好嗎？」

「我喜歡佈置模型火車的 LAYOUT。」

模型屋砌好後，加些人物、橋樑、電線桿、街燈與花草樹木之類的東西，佈置成如真的場景。」

「工作如此繁忙，哪裏還有餘暇砌模型屋？」

「就因為工作太忙，生活過分單調枯燥，總在寫稿時砌些模型屋，從中獲得樂趣與滿足感，減少寫作的疲勞。」

周海嬰笑了，笑容中含有同情與了解。

然後，話題轉到《香港文學》上。我簡單地作了這樣的解釋：

「辦文學雜誌是我多年來的願望，我當然會盡心盡力去做的。問題是：在香港辦文學雜誌有太多的困難需要克服。嚴肅文學在這個社會裏只受少數人的重視與關心，辦文學雜誌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。」

周海嬰略一尋思後，加強語氣說了一句：

「辦文學雜誌應走新路。」

他沒有作進一步的解釋，但是我已明白他的意思。儘管大多數人都不重視嚴肅文學，世界各華文地區出版的嚴肅文學雜

誌為數並不少。辦文學雜誌不走新路，遲早會被淘汰。海嬰的勸告含有積極的意義。

此外，在談論處理事務的時候，周海嬰勸我「對任何問題應該想深一層」。這句話，透澈有力，猶如醍醐灌頂，使我得到啟發。事實上，辦《香港文學》之前，我一直過着煮字療飢的生活，成天伏在書桌上趕稿，雖然辛苦，需要處理的事務倒是很少的；辦了《香港文學》後，稿子的產量大減，需要處理的事務越來越多，往往不經過週密考慮就作出決定，難免有錯。周海嬰講的那句話含意深遠，應該作進一步的討論，可是音樂台上驀地響起琴聲，一下子將我們的談話聲「侵吞」了，我們的談話不得不暫時中輟，集中精神聽歌。那樂師自彈自唱，一連唱了三首粵語時代曲才停頓。我們趁此走去拿水果，回座時，琴聲又起。一個女歌手手持擴音器唱流行歌曲，歌聲很響，雖不至於成為噪音，却使我們提不起談話的興致了。歌聲停止時，我們已將水果吃下。海嬰說：

「餐廳當局要是能夠安排一些說書之類的節目的話，可以寓教育於娛樂。」

「喜歡聽粵語時代曲的人很多，」我說，「餐廳當局請女歌手唱歌，可以刺激營業額上昇。」

侍者走來問我們：「喝咖啡還是茶？」我們向他要了咖啡。

喝咖啡時，海嬰風趣地說了一件往事

「七十年代，我曾到法國去過一次。到了法國，很想吃一些法國蝸牛、生蠔、芝士焗什麼什麼之類的法國菜，可是朋友們只請我吃餃子與紅燒肉，使我大失所望。到了臨走時，有一位朋友答應請我吃一頓道地的法國菜，結果沒有。這件事……」

樂聲又起。這一次，歌聲如浪，滾滾而來，使談話變得十分吃力，我吩咐侍者埋單。

一九八六年三月九日
（本文未經周海嬰先生過目，倘有誤記，作者願負全責。）

郵票六枚，現隨函附奉，有郵票幾張，菊先生送的不錯，海兒沒有蓋章，他布蓋在左下角，清芬，神氣蓋着時通知一聲，更香港來人既多，你們當大熱鬧一番了，去勝幾道不過，菊先生養本不足，不知近來可好，些沒有，為念。上海不氣爽不好，自其有波，間有時差五三了，度，海兒送的甚受影的，由東京吹哨，近已十去，功支揮，沒有清很，假，您算運氣。